



余 娜 著

文化转型的现代探寻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 20世纪30年代的林语堂文学批评研究

—— Research on Lin Yutang's Literary Criticism in 1930s

海外情

林语堂的文学批评自成一家。本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描述与分析林语堂文学批评的立场、观点、方法、风格等。研究全面梳理、辨析了林语堂文学批评与同时代文学批评个体、流派之间共生共存的关系，也力图以个案研究揭示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文化所构成的互动相生的关系。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文化转型的现代探寻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 20世纪30年代的林语堂文学批评研究

—— Research on Lin Yutang's Literary Criticism in 1930s

余娜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转型的现代探寻:20 世纪 30 年代的林语堂文学批评研究/余娜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12

ISBN 978-7-5615-6397-7

I. ①文… II. ①余… III. ①林语堂(1895—1976)—文学评论—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9107 号

出 版 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曾妍妍

封面设计 蒋卓群

责任印制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市金凯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18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本书得到集美大学学术出版基金，集美大学文学院行健学术基金的资助

序

朱水涌

余娜博士的《文化转型的现代探寻》就要出版了,这是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充实修订而成的一项研究林语堂文学批评的学术成果,是一位闽籍新生代学者研究历史上重要闽籍学者的一个可喜收获,作为余娜的博士导师,我自然是欣喜与欣慰的。

林语堂在文坛上被人称为“林博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尽管从欧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者作家很多,却也极少人享有“博士”这顶桂冠。给林先生冠于这顶博士帽的人,虽说是有尊敬者也有讽喻者,但对林语堂来说,那欧美名牌大学的学位及其作为博之学者的身份则是名副其实的,而且他的这顶博士帽特别值得刮目相看,因为这位自期“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作家、学者,他的对中国人讲西方对西方人讲中国的文化睿智、“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的生活智慧,尤其是那无所不窥、融会贯通、亦中亦西的博大,至今依然是我们的博士们很难企及,也是今天的文学博士们特别需要以其为榜样为标高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林语堂研究,似乎另有一番热闹景象。这之间因缘际会种种,但其中的一个原因,用金宏达教授一篇文章的题目来说,便是“全球化:邀林语堂赴宴”,迅猛异常的全球化语境与纷纭变幻的文化景观,更彰显出这位从八闽大地走向世界的文学大师独特与价值。余娜选择研究林语堂作为自己的博士研究课题,不仅是对一个作家的文学批评、审美风格的探讨,也是对时代文化、文学问题的一个切入。但研究林语堂并不容易,正如林语堂的朋友、现代作家徐訏所说:“拿林语堂一本一本书来读它是不够的,只有整个的看他全部的著作,才可看到他的宏阔规模和灿烂生命。”想进入那“宏阔规模和灿烂生命”,这研究者自身的眼

界、素质和艰辛也就可想而知了,但余娜竟然就做成做好了,而且赢得了来自不同高校论文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的称赞,这过程的酸甜苦辣,用余娜自己的话说,是“个中滋味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余娜的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学位都是在厦门大学完成的,正如她所说:“自17岁带着少年的懵懂踏入大学校门,我的人生就此与厦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上本科时,我给他们讲“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位年仅17岁的本科女生,天资聪颖,人也温柔随和,成绩优异。报考硕士研究生时,她依然选择了厦大,选择了现当代文学专业,与高波教授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这倒也很吻合她的气质与性情,这阶段,她修我的“文学思潮研究”与“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课程。硕士毕业后她到集美大学中文系任教,没过几年便又考厦大的文艺学博士,投到我的“现代文学思潮研究”门下,我们原本就是知根知底的师生,这一来就更是无所不谈、无所不论了。那时,我正主持厦大国学研究院的一项重大课题——“闽籍学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这个课题是伴随着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深化与具体化而引发出来的思考。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被植入现代化的历史发展情境,在中国文化由古代向现代转型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有一批闽籍学者发生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他们的学说、思想、创作与活动,作为中国现代性的文化成果,曾经为历史的变革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之声,甚至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从引进西方思想以寻求富国的严复,到新文学“不祧之祖”的林纾,从近代“中学西传”的先驱者陈季同、辜鸿铭,到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先驱卢戡章、“两脚踏东西文化”的林语堂,以及许地山、冰心、庐隐、林徽因、梁遇春等“五四”新文学代表性作家,他们的学术、思想成果与创作实绩,对于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文化选择和人的变化,都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无疑是探讨中国文化转型的宝贵资源,是研究转型期中国人的现代构想、文化理想及其变动、揭示中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多层错综关系的个案,而站在现代中国一百多年后的时空中,这批闽籍学者当年的相同相异乃至相悖的现代构想和文化思考,必定会给我们不少的启示,“闽籍学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是我们学界尤其是闽籍学人特别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由此,我那时要求我的博士生参与到课题研讨中,这就有了余娜师姐曹小娟研究许地山,余娜师妹严昕研究陈季同、辜鸿铭、林语堂的中国形象,而余娜选择了研究林语堂。在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阅读大量的文本之后,她把她的研究聚焦在林语堂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批评上,这自然与她的学术性格、兴趣和积累相关,却也是我要求学生做研究的一种态度与方式:宏观把握,微观论析,从小处着力,往大处思考。

余娜的这部著作,就像副标题所指明的,其研究对象是林语堂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批评,作为对林语堂一段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时期的批评研究,余娜取的是囊括性的整体性批评方式。从林语堂在中国传统文学的批评中融入现代性的思考、探讨传统文学与新文学的脉络关系,到林语堂从外国文学中寻找构建承续古代传统的现代文学的健全资源,从对“五四文学”及其之后文学发展的审美反思,到对林语堂 30 年代文学批评思想与风格的探讨,余娜所竭力发掘与研究的是林语堂在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极为纷纭复杂的时期所做出的审美努力、所呈现的鲜明审美个性、所体现的对文学现代转型的独立探讨与贡献。在我看来,这部研究著作呈现了这样几个关键词:文化转型、现代性、闽籍学者、批评的智慧,从这样的关键词出发,我们大致可以找到这部属于批评的批评的研究专著的特色与作者的用心。

对时代文学的文学批评研究,显然比时代文学创作实绩的研究更有难度,这不仅需要作者有深厚的文学创作实绩的积累,有对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整体把握,而且非常需要作者具备良好的理论素养与理论思维能力。余娜的这部著作从文本进入缕析,在各式各样的思潮中进行条分,从现代性的视野关照,由个人的气质情趣中深入,这使得这部著作呈现出林语堂研究的新意与创意,也流露出一位女性研究者对林语堂批评研究特有的情趣与风貌。

余娜是 2012 年 12 月取得博士学位回到集美大学的,因为同在一个城市,她会像过去一样,每年都找机会与同学一起到老师家中

聊聊侃侃,我就知道她在紧张的教学中,仍然不忘勤奋地开展文学研究,总没有因为一个最高学位的获得便终止了自己的努力。我想,教学与科研,这是一名大学老师天职的两面,两者不可分离。在我的阅历中,就没有一位大学老师不进行科学研究而能将自己的学科教得很有实绩的,也不会有一位教师是因为教学好而科研变差的。如今,我已经快到了古稀之年,“人生七十古来稀”,虽说还没有完全忘却自己的身份,却已经淡出了学术界,没有了曹孟德那难得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壮心,而增多了一种杜甫的“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的悟境。然而,尽管自己的学术兴趣与关注已日渐淡化,但遇到自己学生的成果,我都还要认认真真地读读,实实在在地学学,也就会真真正正地欣喜若狂一回。

2016年12月12日

于厦门大学海滨东区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现代视野下的传统承续	18
第一节 于道德文章寻找人的文学	20
第二节 对经典的现代解读	27
第三节 寻找传统的现代资源	33
第四节 “丛残小语”的现代“不用之用”	53
第二章 推崇自由精神的创作	64
第一节 从西方读到的人生与幽默	65
第二节 对表现独立人格的向往	81
第三节 在表现人性中反思现代性	94
第三章 面对 30 年代文坛的新文学思考	113
第一节 批判与反省：评 30 年代的新文学	114
第二节 “寄沉痛于幽闲”：评周作人	124
第四章 林语堂 30 年代的文学批评思想	130
第一节 文化人格的独立性：“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 胆量”	131
第二节 游戏精神：“赞成一切的业余主义”	149
第三节 平民审美文化：“尘世是惟一的天堂”	157
第五章 林语堂文学批评的风格特征	165
第一节 “以气作文”的创作方法	165
第二节 “湛然有味”的文学品味	172
第三节 “气”与“味”的现代意义	177
结 语	180
参考文献	184
后 记	191

绪 论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批评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繁荣景象。经过“五四”时期的开辟建设,到 30 年代现代文学批评已初具规模。现代文学批评领域最有成就的一批人物,大多是在这个时期取得重要成就或成长起来的。批评家抱着自己的理论主张,以自己独特的批评观念,开展不同观点之间的批评与切磋,使 30 年代成为批评思想非常活跃、批评成果相当丰硕的繁荣时期。本书将林语堂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作为研究对象,立足文本和史料,宏观、全面地把握其文学批评的观点、立场及其风格等,进而探寻林语堂在 30 年代文学批评中所显示出的特质,并讨论林语堂的文学批评与同时代的文学批评的关联,探讨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中,林语堂的文学批评所具有的意义。

一、选题缘起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说的 30 年代,时间范畴是指 1928—1937 年。这时期的中国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统治政府的管理控制力日渐巩固加强,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社会文化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经历过“五四”时期的发生发展的历练后,呈现出鲜明的特色:政治化色彩日益浓重、文学群体分化对立、各类文学发展进入成熟时期。“五四”时期处于社会新旧嬗变阶段,文学强调个性、偏向形而上的问题。但到了 1928 年后,根据不同的政治立场或文化追求,文学分化为革命文学、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不同阵营。虽然 30 年代的社会高度政治化,但作家们大多都明确了自身的文学理想,以自己的方式观照世界、表达思考。茅盾、老舍、沈从文、巴金、曹禺等现代文学大家的重要作品陆续在这个时期问世,不仅作家的创作成果显著,而且文学理论批评也异彩纷呈,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中很难有其他时期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展,带来了文学观念和批评理论的迅速转变,反对传统、倡导西方文明成为大势所趋。到了 30 年代,经历过低潮的沉寂、冷静之

后的新文学批评逐渐成熟,改变了新文学倡导时期的急躁急进,进入思想多元、实践丰富的阶段。中国新文学批评在30年代既有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现和继承,又有对外国文学思想的选择性接受;既有对新文学发展以来作家作品、文学历史的理论研究,又有对年轻作家创作的扶持和某种文学观念的坚持。

曾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如下两大分野:“从梁启超的文学功利观到‘五四’以后不少作家批评家特别是文学研究会诸贤的‘为人生’到30年代社会批评派瞿秋白、冯雪峰、鲁迅、茅盾以及40年代的何其芳、周扬等,这大体上可以看作是文学批评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作了某些概括和总结。另一个系统即:‘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到三四十年代的梁实秋、李健吾、沈从文、李长之、萧乾、朱光潜等,无论是文学的人性表现论,还是人道主义的倡扬等,这些作家和批评家们的文学理念、文学思想大同小异。”^①这两大系统的归纳,基本将批评界分为两种声音,一种是日趋占据主导的社会关怀批评,另一种是重视审美的超功利的批评。如此的概括便于把握宏观的文学批评发展态势,但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批评家独具个性的思想观念,不利于深入理解文学批评在文艺理论、文艺规律等方面的探索。因此,笔者倾向于将30年代文学批评界视为竞放争鸣的喧哗时代。

“百年中国文学这辆车,本有两个轮子,一是作家——作品,一是思潮——理论,且学者暨批评家为百年文坛留下的世纪性痕迹,并不比作家浅,但他们在当今学界所承蒙的重视程度却远不如前者。”^②夏中义先生在表达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思想研究状况的遗憾时,明确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创作和批评并行的事实。从“五四”新文学发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便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一起发展的。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现代文学批评在20世纪30年代渐趋成熟,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各具特色、个性鲜明的文学批评蔚然成风,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产生,它们的发生一开始主要是出于社会革新的需要,“新文学的产生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运动,它是新文化的一环,它是接续着清末维新运动的,所以它在开始就朝着‘致用’

① 卜召林.中国现代新文学批评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408-409.

② 夏中义.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总序[M]//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走。这并不错,而且也是一种必然”^①。特殊的历史时代赋予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先天地具备了两大特性——社会前进发展的工具功能和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二者互为牵制,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处于功利与审美的矛盾夹缝中。20世纪30年代,文化阵营分化比“五四”时期更为严重,文学批评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各种政治势力和思想倾向在文学政治化和文学审美化的要求上,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在这纷扰的文化环境中,各种文学批评得以朝着各自的方向深入发展,形成了各领风骚的文学思想。其中,影响广大颇具代表性的批评家有茅盾、周作人、李健吾、朱光潜、胡风、梁实秋、林语堂等,他们的批评实践和思想体现出30年代文学批评界对文学与政治、审美关系的多元认识。

茅盾的社会历史批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批评、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朱光潜的直觉美学批评、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批评、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批评……这些各具特色的批评思想,学界基本上对他们的理论主张和艺术风格都已达成共识,将他们视为某一流派或倾向的标志代表。^②然而,林语堂的文学批评,却因了自己丰富的跨文化创作,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领域中显得并不起眼。事实上,林语堂从“五四”后期涉足现代文学,积极参与“语丝”派的文化文学批评活动,就开始探索现代文学与社会、人生结合的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提倡“幽默”和性灵文学,积极投身于现代散文建设的实践。在融汇古今、打通中外的尝试里,他的批评思想和批评风格逐渐成熟起来,形成了重视审美人生、追求个人自由的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独具异彩。

笔者选择20世纪30年代这个时间范畴,原因在于: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上,30年代具有重要的意义。许多优秀的文学成果在30年代自由的氛围中产生,日后众多的文学思想、观念、流派也都已孕育成型。另一方面,林语堂在30年代“转型”,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和文学观念。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斥“文妖”、伐“走狗”,满怀的革命激情显示出他思想上斗士的一面。随着政治时局的变化,知识分子群体发生分化,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处于犹豫彷徨之中。朱自清的《那里走》道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迷惘:“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大家惶惶然。革命者是无意

① 常风.新文学与古文学[J].文学杂志,1947,2(3):36.

② 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研究的论著中,上述诸位批评家几乎都是专章介绍论述,如刘锋杰的《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卜召林的《中国现代新文学批评研究》等。

或有意造成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①林语堂同样感受着惶惶然的寂寞，他选择坚守独立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将“五四”革命的情结转化为对个人自由主义的维护，主动承担起知识分子文化传承与建设的责任，由社会改造转向文化建构。在现代文化的广阔视野下，林语堂的文学批评成为“五四”精神延续的表达，成为他的文学思想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时期，林语堂依然在思考着“人”的问题，用旁观者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向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向中国人讲西方文化”，主张文化融合。这些都成为林语堂毕生探寻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

20世纪30年代现代文学的批评初具规模，整体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繁荣景象。林语堂先后主持《论语》《人间世》等刊物，倡导“性灵”和“幽默”，创作进入了繁盛期，其中以散文居多。他的散文内容大多关涉文学、文化，林语堂的文学思想散见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中。借由这些文字，林语堂在面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时，表达了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和对“人性”、对自由的独立思考，也重新认识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此时的林语堂在复杂多元的文学批评中自成一家，其个人自由主义的文学批评和其他的文学批评流派共同构成独特的30年代文学批评局面。因此，有必要将这个阶段林语堂的文学批评呈现出来，这既是对作家个体思想的研究，又能增强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完整认识。

二、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林语堂是一位蜚声海内外却又备受争议的现代作家。在国际社会上，他的影响甚大：长篇小说《京华烟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林语堂本人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吾国吾民》被视为是了解中国的重要参考书之一，《生活的艺术》自1937年出版以来，在美国重印超过40版，并被译成十几种不同的文字，在英、法、德、意、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畅销不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语堂在中国大陆的境遇。经历了20年代激情战斗的浮躁凌厉时期，林语堂在30年代就受到众多非议，逐渐被冠之以“反动文人”等名号，长期被贬斥。新中国成立后将近30年的时间里，他的著作在大陆未再出版，对他的研究也无人问津。这种冷落萧条的局面直到1979年后才逐渐改变，特别是近些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林

①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4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236.

语堂研究呈迅速升温之势。

在海外,对林语堂的研究一直持续不绝。

香港、台湾学者在林语堂资料发掘研究方面,做得相当扎实,近几年又有不少发现。香港钱锁桥教授收集到林语堂的50篇双语短剧文,其中48篇是在1930—1936年间所作,这对于研究林语堂双语写作贡献巨大。台湾学者秦贤次一直都在从事林语堂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近几年发掘出新的史料,从《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找到林语堂父亲及其家庭的介绍资料,在《林语堂与圣约翰大学》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圣约翰大学,还考证出林语堂大学期间的四次登台领奖的具体奖项。

美籍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都认为林语堂30年代的文学在逃避社会现实,只讲究生活享乐,失去批判性和现实性。与之观点正好相反,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认为林语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作家,指出林语堂在30年代并非不关心政治,只是他提倡的幽默和闲话的艺术,以一种审美的方式来审视中国社会,同当时主流文学拉开了距离。顾彬肯定了林语堂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指出能和杂文最重要作家鲁迅比肩的,当属林语堂,“在政治和抒情散文这个领域中的真正对手应是前面提过的自由派代表林语堂”^①。

中国大陆对林语堂的研究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的滥觞期,40年代到1979年的沉寂期和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复苏发展期,之后,在21世纪之初迎来了快速发展期。对林语堂的研究,已形成一定规模,各种正式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达数百篇之多,以林语堂作为博士、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的也为数不少,与林语堂相关的著作也数量可观。按照目前较为普遍的划分方法,笔者把林语堂的研究情况划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以前和90年代至今。

先来看看90年代以前的研究情况。

90年代以前的林语堂研究,最早可以上溯到30年代。

1934年,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林语堂小品序》中明确将林语堂作为幽默文学的代表作家。阿英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情势,认为林语堂文学创作上选择“幽默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并指出幽默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强调幽默文学的社会意义。他引述林语堂的文字说明了幽默文学的含义,并发现林语堂创作出现了变化,“初期的特征是逐渐的消失,而倾向于社会的讽刺以及身边的

^①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66.

琐事了”，同时表达了担忧：“中国幽默文学，现在是在一个歧路上。”^①阿英的评价主要是在社会阶级的立场上，对当时小品文发展情况进行梳理研究。他在《现代十六家小品序》中指出，外在的社会原因促使小品文发生分化，还肯定了鲁迅等人的战斗精神和革命姿态，批评了胡适、周作人、林语堂逐渐失去进步，而向下努力，走向没落。

1935年，胡风发表的《林语堂论》，可以算是左翼文学对林语堂较为客观的批判。他站在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功利功用角度，批判林语堂提倡的个性和幽默，文章这样写道：“他底‘个性’既没有一定的社会的土壤，又不受一定的社会限制，渺渺茫茫……忘记了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们中间赞美个性是怎样一个绝大的‘幽默’，忘记了大多数人底个性之多样的发展只有在争得了一定的前提条件以后。问题是，我们不懂林氏何以会在这个血腥的社会里面找出了来路不明的到处通用的超然的‘个性’。”至于幽默，“也不能不受一定的限制。第一是，如果离开‘社会的关心’，无论是傻笑冷笑以至什么会心的微笑，都会转移人们的注意中心，变成某种心理的或生理的愉快，‘为笑笑而笑笑’……第二是，就是真正的幽默罢，但那地盘也是非常小的。子弹呼呼叫的地方的人们无暇幽默，赤地千里流离失所的人们无暇幽默，彳亍在街头巷尾的失业的人们也无暇幽默。他们无暇来谈谈心灵健全不健全的问题。世态如此凄惶，不肯多给我们一点幽默的余裕，未始不是林氏的‘不幸’罢。”^②胡风论林语堂，肯定了林语堂“语丝”时期的社会战斗精神，批评他在“论语”期间，脱离社会实际提出幽默、性灵，并指出林语堂的矛盾中庸在20年代就有苗头了。这些话语显示出左翼文学在文学本质、宗旨、功能等方面，和林语堂的理解存在着根本不同。

由于文学主张和政治立场上的不同，30年代林语堂和左翼文学发生了论争。左翼文学对林语堂的评价大多是从政治方面考察的，这也影响了后来近半个世纪对林语堂公允的评价。

事实上，30年代鲁迅、郁达夫等人对林语堂都有比较客观真诚的评价。鲁迅曾批评林语堂提倡小品文不合时宜，批评小品文为“文学上的小摆设”，“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指出小品文不符合时代要求，“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功夫，来赏玩

① 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林语堂小品序[M]//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467.

② 胡风.胡风评论集(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5-25.

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①鲁迅不讳言与林语堂在文学上的分歧，“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②。尽管不满意林语堂的幽默、闲适格调的文学与时代脱节，但鲁迅并未否定林语堂的文学成就，“1936年5月，鲁迅在回答斯诺提出的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是谁这一问题时，鲁迅举出了周作人、林语堂、陈独秀、梁启超和他五人作为代表”^③。

郁达夫则对林语堂此时的文学观念予以肯定。他认同林语堂提出的散文范围可以“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谈”，赞同林语堂提倡的幽默，他这样评价林语堂：“《翦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引外国人所说的隐士和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話，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林语堂身上，尤其是用得着。”^④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相对客观的评价被充满政治色彩的声音所掩盖，林语堂将“反动文人”“御用文人”的称号从30年代一直背负到70年代后期思想解放运动之后。

80年代的林语堂研究可以说是生机勃勃。这一时期，林语堂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突破政治的樊篱，寻求林语堂小说和散文的“积极面”。如陈金淦的《评“论语派”》（《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施建伟的《论语派与〈论语〉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期）等文章在批判其消极面的同时，也做出了中肯的评价。

二是注重林语堂史料的发掘并对其做出全面评价。万平近的《林语堂的生活之路》（《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3期）以及专著《林语堂论》是最为突出的，在史料发掘与研究方面可以说是填补了空白。唐弢先生的《林语堂传》借用周作人关于“两个鬼”的说法来分析林语堂的“一团矛盾”中的矛盾性，对林

①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M]//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75.

② 鲁迅.《论语》一年[M]//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82.

③ 陈漱渝.“相得”与“疏离”: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史实及其文化思考[J].鲁迅研究月刊,1994(12):30-41.

④ 郁达夫.导言[M]//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16.

语堂的研究具有很大意义。

三是研究开始涉足林语堂的文学观、文化观及人生观等重要命题,如幽默观、东西文化等。施建伟是少有的集中关注这一命题的人,他的《林语堂幽默观的发展轨迹》(《文艺研究》1989年第6期)和《论林语堂的幽默观》(《社会科学》1989年第11期),从林语堂幽默观的发展变化中论述其独特性,开了对林语堂“幽默观”研究的先河。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背景下探讨林语堂的文化意义,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课题。陈平原的《林语堂与东西方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和另一篇文章《论林语堂东西综合的审美理想》(收入《在东西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都探讨了林语堂中西综合的审美观和在文化史上的典型意义。另外万平近的《从文化视角看林语堂》也是一篇力作。

这一阶段的林语堂研究不论是早期的毁誉不一的评价,还是后来的“政治翻案”,大多是从政治角度进入,对林语堂进行阶级性的评判。这表明,林语堂研究有待深化和开拓。

较之90年代以前的研究情况,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90年代以后的林语堂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第一,研究范围全面。主要表现在对林语堂散文创作及其散文的美学价值、个性和影响的研究上,另外对他的小说的整体研究也取得了突破。

散文研究方面,微观深入探讨林语堂散文的有:蒋心焕、吴秀亮的《试论闲适派散文——兼及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散文之比较》(《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周质平的《林语堂与小品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陈剑晖的《“五四”时期的“性灵”散文思潮》(《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等等。

小说研究方面,研究者既有关关注某部作品又有对小说的整体研究。对单部著作的研究有刘勇的《论林语堂〈京华烟云〉的文化意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朱东宇的《伦理性人物与哲理性主题——论〈红牡丹〉的文化精神》(《求是学刊》1998年第3期)等论文,都对文本进行了有意味的解读,阐发了该小说的丰富内蕴。对林语堂小说的整体研究和评价主要包含了小说的审美风格、描写模式、叙事构型、文化价值等内容,如孙凯风的《林语堂小说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李建生、王能昌的《论林语堂小说的文化构成与审美品格》(《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黄万华先生的《40年代:文学开放性体系的形成——兼及林语堂小说的文化视角》(《理论学刊》2002年第2期)。